

论传播视野中的《三国演义》

王运涛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03)

摘要: 古典名著是民族文化的传播载体, 本文试图站在文化传播的视角, 从传播要素、传播特征和传播模式以及传播启示四方面入手, 以《三国演义》为例, 探索中国古典名著的文化传播策略。

关键词: 《三国演义》; 传播研究; 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志码:** A

既往学界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大多注重于对作家作品的考察和对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 着眼于它的本事来源及其影响等, 而从传播学角度对其研究则用力不多。下面是论者在传播学视野下对《三国演义》进行文化把握和理论阐释的一次尝试。

一、《三国演义》的传播要素

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拉斯韦尔认为, 一个传播过程包含五大要素: 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 即: 传播主体(即传播者)、传播内容(即讯息)、传播渠道(即媒介)、传播对象(即接收者)和传播效果(即效果影响)^[1]。

1. 传播者的多元纷杂是《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动力所在

传播者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组织。《三国演义》的传播者, 既有不知名的群众作者, 如宋朝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有记载霍四究说三分之事, 霍四究就是善说三国故事的人; 也有很知名文人作家, 如西晋的陈寿、刘宋时的裴松之; 更有众多文人有意无意间参与了“三国故事”的传播, 如宋刘义庆、唐代的李商隐、宋苏轼等。《三国演义》的博大精深也吸引了西方传教士、外籍华人、留学生、商人等的注意, 并通过他们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

2. 传播内容的通俗化, 传达精神的平民化是《三国演义》得以广泛传播的基础

《三国演义》的伟大成就在于具体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内部的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三国演义》中刘、关、张之间团结、平等和义气的关系及其处处流露的正统思想和忠义精神, 是《三国演义》最为人们喜爱, 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的地方, 一直成为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加强团结、相互援助的榜样, 成为人和人的正直关系的榜样。如在明、清两代, 农民起义军就常把“桃园结义”的三兄弟当作自己的楷模^[2]。也正是其传达精神的平民化这一点, 为我们探究现代香港黑社会争拜“关二爷”的文化底蕴, 打开了一个研究的窗口。

3. 传播语言的口语化是《三国演义》“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前提

历史演义是中国文学的特色, 说书人透过讲史吸引听众, 将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加以发挥, 加上一些夸大的想象, 创造出虚实相生的故事, 《三国演义》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演义。《三国演义》从口传文学到话本杂剧, 再到小说成书, 是在民间“说唱艺人”表演传播的基础上, 经由文人的整理加工最后写就的, 由题材内容到体裁样式, 均广泛吸纳和多方借鉴民间“说唱艺人”传唱表演的口头传说故事。虽发根于正史, 却更多地取材于民间口头创作, 直接汲取了民间创作的题材、思想、形象和语言, 使作家的天才和民众的智能得到了高度的结合。其作品中的人物至今仍然通过民间艺人的鼓词、评书、戏曲活灵活现地生活在他们原始发生的土壤里。

4. 传播对象的内外拓展、彼此呼应是《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关键

《三国演义》的读者分为直接读者与间接读者两大类：直接读者通过阅读小说文本来接受小说内容；间接读者则依靠听书、看戏等途径，间接接受小说内容。直接读者与间接读者，分别确立了明清通俗小说两种最为基本的传播方式——书籍传播与曲艺传播。《三国演义》的国内受传者人数众多，相对分散；国外受传者主要是一些高素质的群体，他们同时又是向西方传播《三国演义》的传播者。如早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日本人湖南文山就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日文，这是《三国演义》最早的外文译本。三百年来，《三国演义》已经被亚、欧、美诸国译成各种文字，全译本、节译本共达六十多种。

5. 传播效果是对整个传播过程的检验和反思总结，对新的传播过程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享有崇高的地位，是最深入民间的传统小说，不论在戏剧、生活、宗教、甚至时下流行的漫画及电子游戏中都可见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可见其历久弥新的价值。《三国演义》的价值，至少可分为文学价值与实用价值。在实用价值方面，有人将三国演义当作治世的兵书，商场竞争的宝典，熟读三国，不仅可以增长人对人对事的应对技巧，若能活用“三国”，更能让人无往不利。

二、《三国演义》的传播特征

1. 《三国演义》的传播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极大

《三国演义》不仅是在传播一个故事，也是在传播一种文化，因此必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大。因此，国外的“三国热”主要发生在传统文化背景相似或者交流频繁的亚洲地区，尤其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仅横山光辉改编的《漫画三国志》，就有大小两种开本，印数已经超过三千万套，几乎等于每个日本家庭都有一套，普及率之高，竟超过中国。日本的“三国”研究著作多达几十种，要论“本体研究”，应该说不及中国；但其从人际关系、经营管理、商战谋略等角度进行的“应用研究”则似乎比中国更活跃。日本的“三国迷”遍及全国，他们自发组织的“三国迷俱乐部”就有上百个。在欧美国家，由于文化传统不同，《三国演义》的传播则远不如亚洲那么广泛。

2. 《三国演义》传播的根基始终在民间

《三国演义》不仅取材于史料，还取材于《三国志平话》等民间艺术。正是由于它们源自遥远的文化历史深处，具有丰富的信息语码和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空间，从而赋予了小说永恒的魅力和挖掘不尽的思想源泉。使得《三国演义》在民众心中深深扎根。刘备与关羽的道德模范比孔子、孟子更加普及、有效而重要。如应当像刘备、关羽那样重视对朋友的义气，决不可像曹操那样忘恩负义。香港的警察以及黑社会人物都要设神龛拜关公，却不拜孔子，也不拜耶稣、不拜如来佛。小说人物成为大众宗教式崇拜的对象，这是全世界任何文学作品都做不到的。关羽受后人尊崇，全靠《三国演义》夸张了他的重义。中国民间最重视的道德，第一是孝，第二就是义。一部小说把一名武将捧成了神，不但由于小说的魅力，也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性格。

3. 在传播内容上追求多元的典型，蕴涵丰富的价值观念。三国的历史，从时间上看，只有半个多世纪，比较集中；从政治格局来看，是三足鼎立，三者之间互相牵制，很富有戏剧色彩；从人物方面看，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君主都可称明主，文臣武将亦多出类拔萃。从事功方面看，都打着正统或维护正统的旗号，谋求剪除异己，实现新的统一。在很短的时间里，集中了这样一大批智勇之士，演出了群雄逐鹿、三国鼎立、西晋统一等一幕幕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三国演义》是雅俗共赏的作品，其丰富的精神内容凝聚着晋唐以来社会广大群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着社会各阶层意识的折衷，在相当程度上集中、融会了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古以后我们民族的普遍思想意识、道德观念，这正是《三国

演义》数百年来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广泛接受认同，亦为最高统治者所容纳和利用的原因。

4. 在传播方式上，能够积极借助新的信息形式和最有力的传播载体。传播载体的多元化是《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保证。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以《三国演义》的传播最具广泛性，这跟三国故事的传播载体众多不无关系。从三国历史到《三国演义》，从话本戏曲到传说故事；以及诸多有关三国的历史遗迹、遗址、纪念性建筑物，辅以有关三国的历史、故事、传说；加以史学和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包括传记、小说、绘画、戏曲、影视等)；兼有三国的学术研究：多方互动、彼此相应、虚实相生。这不能不说是文学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进入信息时代，《三国演义》又较早与高科技结合，被传播者迅速做成电子游戏在青少年中广泛传播。

三、《三国演义》的传播模式

纵观《三国演义》的传播过程，宏观上似可归为“高山流水式”的传播模式。“高山流水式”的传播模式就是蕴含传播者思想内容的信息包括文学、音乐等作品从传播者流传开来，如泉水从山顶流下一般，其过程中吸纳百川汇成巨流，从而形成一种信息的洪流，致使传播的态势越来越顺畅并最终取得很好的传播效果的一种传播方式。作品自身越成功就对受众越具有吸引力，就越能够在传播过程中吸引读者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二次创作，内容也随之越来越充实饱满，而内容越厚重传播得就越顺利。由此循环往复，作品就逐渐成了一种渗透全社会的文化现象。三国故事发生的东汉时期距罗贯中成书的元明之际已有一千多年时间差。这个时间差至关重要，在数百乃至上千年的悠长年代中，人们在传述三国故事的过程中，又孳生和粘附了超过小说容量的更多的文化内容，已经将各种历史时期的思想意识、政治、伦理、历史评价标准、人生价值观，统统熔铸在历史故事之中。到罗贯中成书时，围绕着《三国演义》已经粘附了以汉族为主的几乎全部中国文化^[1]。由于小说接受了一千多年各阶层人士评价和解释三国史的意识积累，使其历史观、政治伦理观以至人生价值观皆具有历时性全民共识的意义。因此，它比任何正史更能引起世人的关注，更为大众喜闻乐道。

四、《三国演义》的传播启示

1. 凡是伟大的作品，总带给读者许多的想象，给予读者们各种各样思索的精神食粮

三国历史给后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后人从三国历史中得到的启迪是多方面的，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但可以举个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诸葛亮的忠贞、济世、敬业、至公、廉洁、谦虚等品格为历代君主、官吏、士人和老百姓所称颂。唐太宗称他为“贤相”，治国“正直”，“至公”，要群臣学习。乾隆《五贤祠诗》说：“端称诸葛是完人”。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说：观历代“秉事君之节，具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有治人之术”者，唯诸葛亮一人。南宋理学家王柏仰慕诸葛亮，特刻其石像供奉。朱子“每酒酣，多朗诵《出师表》”。可以说，诸葛亮思想的积极面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中，它将永远昭示来者。

2. 积极借助新的信息形式和最有力的传播载体有利于推动文学的广泛传播

《三国演义》的顺利传播，依赖于作者采用当时人们的视角和审美观念进行再创作，选择能使受众感兴趣的内容，采用受众常接触的媒体等等。小说的以口语为传媒的改编传播，只在宋元时流行，之后虽延续不断直至今日的“评书”，但对于小说的传播只作为辅助方式存在，文字传播才是最主要的。信息载体不断更新的过程，就是古代文学逐步传播开来的过程。从最早的口耳相传，到绘画传情、结绳记事，再到诉之于龟甲兽骨、铜竹绢帛，一直演变到纸的发明和应用，新的文学都会及时地表现在新的信息载体上。现代社会，出现了语言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等，古典文学的传播应采取多种媒介的组合。

3. 传播的内容借助于鲜明的形象更容易深入人心

《三国演义》写人物不直接叙述其内心，单凭言语动作，人物精神自出，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度技巧。有些近代中国小说努力去学西洋小说，着重描写人物的内心思想，读来沉闷，人物性格并不明确，这是不学习中国古典小说技法之故。在明代四大奇书之中，以《[三国演义](#)》最能深入民心，不论是书中人物或者故事情节，大家几乎都能说上几段。情节方面，例如“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草船借箭”、“孔明借东风”、“火烧赤壁”、“关公过五关斩六将”以及“空城计”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人物方面，如忠勇双全的关公、神机妙算的孔明以及乱世奸雄曹操，更是《三国演义》之中描写得最成功的人物。^[4]

4. 文学的传播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大。明清两朝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各类社会矛盾尖锐，统治者除加强君主专制外，还企图用儒家思想塑造超人的神的力量来维护统治。以关羽为例。关羽由人向神的转化，始于两宋之交。当时，宋王朝岌岌可危，希望有像关羽这样“大义大勇”的神来保护它。北宋末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南宋关羽成为拯救民生劫难之神。明清两代对关羽的推崇达到极点。明政府封关羽为“武庙”的主神，与“文庙”的孔子相对应。清顺治时被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同时，关羽显灵保卫明、清王朝的神话不断出现，而且见于诏书之中。在封建王朝的提倡下，关羽“庙祀遍天下”。显然，政府的支持作用，更巩固和强化了人们对三国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关注。古典文学的传播必须考虑到传播环境对文学传播的影响，如制度环境及文化背景等等，并充分利用其对文学传播积极推动方面的影响。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是由作品本身的力量与产生作品的土壤即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性质的力量共同形成的。这主要得益于开放的文本容许多时代不同阶层的人员参与进来，使其宗教观、政治伦理观以至人生价值观具有历时性全民共识的意义，成为雅俗共赏的作品，得以“高山流水式”的代代相传，最终成为跨越时代、跨越民族、跨越国度的作品。作为古典文学的当下传播者，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当下受传者的情感、思想和动机，站在接受者的角度考虑古典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者互动并重视接受者对古典文学传播的反馈信息，进而采用符合受众的传播媒介及技巧，才有助我国古典文学传播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2]鲁地.《三国演义》论集[M].杭州：东海文艺出版社，1957.
- [3]何满子.何满子学术文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224.
- [4]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Three Countries' on Spreading Theory

Wang YunTao, Wang Rui

(Zhengzhou Radio & TV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13, 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Countries' can be spread in a style as lofty mountains and flowing water. In the course of spreading, they have got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written with strange news and extraordinary affair, emphasizing moral sense, spreading at the best time and place etc.

Key words: 'The Three Countries'; Spreading ;the Characteristic